

# “未完成的议程”： 巴基斯坦建国的内部阻力问题初探<sup>\*</sup>

陈邹斌

**【摘要】**随着1947年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次大陆的终结，印度和巴基斯坦依据《蒙巴顿方案》分别建国。巴基斯坦的诞生是真纳的建国理论的胜利。但对于这个新生国家的建立，“准巴基斯坦人”内部存在着三股反对建国的力量：一是出于维护印度人民的团结，反对将印度一分为二；二是质疑真纳所领导的政党之“唯一代表者”地位，批判该党无视其他政治派别的主张；三是基于对“巴基斯坦国”这一概念的分歧，拒绝接受真纳的国家构建理论。由于真纳国父地位的确立以及印度教激进主义的蔓延，反对建国者最终失败了。虽然他们最终并未成功阻止巴基斯坦的建立，但理解真纳对手的主张对于重新评估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巴基斯坦人”这一符号的多元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巴基斯坦建国运动 “巴基斯坦人” 内部阻力 未完成性

**【作者简介】**陈邹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353.4/K35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20)06-0121-12

二战后，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英国急于从南亚脱身，欲将殖民地的权力迅速移交给殖民地人民。1947年2月20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宣布，无论印度两党是否达成协议，英方都将于1948年6月前向印度移交权力。在无法使用拖延谈判策略以获得更大利益的情况下，两党最终接受《蒙巴顿方案》(Mountbatten's Plan)，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分治的方式分别建国。印巴分治是在极为仓促的政治决断中形成的，这一改变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政治安排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品，反而成为此后印巴两国一系列外交问题的来源。对于巴基斯坦人来说，巴基斯坦的建立的确让他们欣喜，但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并不清楚“巴基斯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事实上，在争取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政治精英们。虽然早在1940年，真纳所领导的政党便已通过“巴基斯坦决议”(the Pakistan Resolution)，提出了巴基斯坦的建国主张，但并未明确以何种方式实现建国。这倒并非巴基斯坦所独遇的困窘，而是20世纪以来东方国家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过程中普遍会面对的一个现代性难题，即其传统文明形态如何与发轫于近代西

<sup>\*</sup> 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 *Muslims against the Muslim League* 一书的编著者阿里·乌斯曼·卡斯密(Ali Usman Qasmi)与梅根·伊顿·罗柏(Megan Eaton Robb)提供的关键线索与提示，并得到匿名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方的现代国家建构模式融洽相处。作为东方世界中较早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巴基斯坦在建国运动中所呈现的问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的研究普遍认同一个经典的“伟大历史叙事”：在真纳的领导下，巴基斯坦人民通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巴基斯坦国；作为巴基斯坦建国理论的提出者与实践者，真纳得到了一致拥护。虽然这一叙事模式用凝练的语言描述了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的历史发展轨迹，但它对真纳占据意识形态领域压倒性地位的成见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张力。在“准巴基斯坦人”内部，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存在反对主张，这构成了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伟大历史叙事”背后的另一副面相。<sup>①</sup>真纳的巴基斯坦建国主张在理论层面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并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并非每一个人都将巴基斯坦视为美梦；并非每一个人都将真纳视为领袖”。<sup>②</sup>“巴基斯坦建国运动”是一个省略的命题，把主语和谓语补充之后的完整命题应当是“谁发动了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由此命题出发，可以继续提出一个与之相对的命题，即“谁阻挠了巴基斯坦建国运动”。这两个命题充分展现了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的复杂性，时至今日，巴基斯坦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仍然是这两个命题的继续和衍生。

从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审视，真纳的建国主张与反对建国者的主张共同构成了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丰富多元的意识形态光谱，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建设所呈现的是多种建国主张纵横交错、反复交锋的动态过程。归根结底，真纳与反对建国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充分反映了巴基斯坦的建立是一项“未完成的议程”（unfinished agenda）。<sup>③</sup>虽然反对建国者并未掀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最终也未阻止巴基斯坦的建立，但了解这场意识形态论争，理解真纳对手的主张，对于重新评估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巴基斯坦人”这一符号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sup>④</sup>随着巴基斯坦的建立，该意识形态的论争只是被短暂地掩盖了，它在思想上的潜流并没有彻底消释，而是以另外的形式残留了下来。本文试图从建国意识形态的多面性这一层面，对巴基斯坦建国的“未完成性”加以探究，以期丰富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的历史叙事，深化学界对巴基斯坦建国运动多元性的认识。

① 国内对于印巴分治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唐仁虎：《教派冲突与印度分治》，《南亚研究》2012年第3期，第99~110页；谔焕义：《浅析有关印巴分治的若干观点》，《学海》2008年第4期，第155~162页；陈劫：《印巴分治社会原因之剖析》，《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第3期，第39~50页。对于巴基斯坦建国理论的研究，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王希：《巴基斯坦国父真纳政治思想初探》，《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28~37页；杨翠柏：《真纳与巴基斯坦独立运动》，《南亚研究季刊》1997年第3期，第24~28页。除个别论文外，国内学者对于巴基斯坦建国理论及思想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于国外新的研究资料的挖掘略显不足。总体而言，国内学界以往对于“印巴分治”这一历史事件研究，在“‘准巴基斯坦人’对待分治”这一问题上，未对其内部的严重分歧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对于理解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巴基斯坦人”这一符号的复杂性是一个缺憾。在国外英文文献中，对于巴基斯坦建国的内部阻力问题研究也属于近几年兴起的前沿范畴，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Shamsul Islam, *Muslims against Partition*, New Delhi: Pharos Media & Publishing Pvt. Ltd., 2015;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eds., *Muslims against the Muslim League: Critiques of the Idea of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Mushirul Hasan, *Memories of a Fragmented Nation: Rewriting the Histories of India's Parti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3 (41), 1998, p 2665.

③ “未完成的”（unfinished）一词在有关巴基斯坦问题研究的英文文献中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它表示巴基斯坦在1947年建国之后仍然在国家认同方面存在着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它的建国任务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终结。可参见 Mushirul Hasan and Nariaki Nakazato, eds., *The Unfinished Agenda: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Manohar, 2001; S. R. Sen, *Unfinished Task of Parti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41), 1994, pp 2664-2666; Christophe Jaffrelot, *Nationalism Without a Nation: Pakistan Searching for its Identity*, in Christophe Jaffrelot, ed., *Pakistan: Nationalism without a Nation?* New Delhi: Manohar, 2002, pp 7-47.

④ 反对建国者是否存在意识形态论争之外的大规模政治活动？笔者在目前所掌握的英文文献中均未找到反对建国者实施了理论层面之外的大规模政治活动的证据。出于学术严谨的考虑，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向阿里·乌斯曼·卡斯密与梅根·伊顿·罗柏分别求证，两位学者均表示意识形态论争是反对建国者最主要的斗争方式。

## 一、分治给在印巴基斯坦人带来的困境

从“巴基斯坦决议”到巴基斯坦的诞生只有短短七年时间，从艾德礼宣布英国移交权力的最后期限到印巴完成分治只有区区半年时间，对印巴双方而言，分治方案从出台到最终完成，不可谓不仓促。对巴基斯坦人来说，仓促的分治所导致的若干困境却是长期存在的，难以在短时间内破解。

印巴分治后，有 3500 万巴基斯坦人滞留在了印度。<sup>①</sup> 他们处境尴尬，被视为对印度的威胁，是巴基斯坦隐藏在印度的“第五纵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印度教激进主义者的迫害。“第五纵队化”的观点认为，这批“滞留者”在分治前大都参与了真纳发动的巴基斯坦建国运动，客观上，他们对巴基斯坦的感情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改变，他们对印度的忠诚因而是大可怀疑的，正因如此，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印度公民的身份。<sup>②</sup>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教徒与“准巴基斯坦人”之间仇恨的种子早就埋下了，分治只是一个“催化剂”。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教激进主义者希马尼·萨瓦尔卡尔（Himani Savarkar）提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家园，非印度教徒应当被驱逐出印度。他想象的未来的印度，是一个由纯粹的印度教徒组成的国家，因为非印度教徒都没有在文化上被印度教同化。<sup>③</sup> 1925 年，代表印度教激进主义及排他主张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 RSS，英译名 National Volunteer Organization）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Maharashtra）成立。该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主张用武力打击和肉体消灭的方法来解决所谓的“巴基斯坦人威胁”。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在印巴分治的命运已无法逆转的情况下，印度教徒中所谓的“巴基斯坦人威胁论”甚嚣尘上。印度教激进主义者马达夫·萨达希夫·戈尔瓦尔卡（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1905—1973）被国民志愿服务团视为组织的精神支柱，他所著的《一堆想法》（*Bunch of Thoughts*）一书，充分勾勒了印度教激进主义者眼中所谓的“巴基斯坦人威胁”。戈尔瓦尔卡认为，随着巴基斯坦的建立，这种威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为严峻，印度境内“滞留者”的落脚之处将构成巴基斯坦在印度领土上的反印据点。<sup>④</sup> 通过这些星罗棋布的据点，巴基斯坦可以遥控指挥印度境内的“第五纵队”，印度随时面临着巴基斯坦“特洛伊木马”式的进攻。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印度的“巴基斯坦人威胁”，国民志愿服务团甚至预谋在邻近德里的地区发动清洗行动。<sup>⑤</sup>

事实上，早在 1939 年，戈尔瓦尔卡便在《我们或我们所定义的国家》（*We or Our Nationhood Defined*）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印度教激进主义者的印度建国方案。为解决在印度生活的非印度教徒问题，他给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彻底同化，二是对特定人口进行清洗。根据他的观点，“对印度的非印度教徒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融入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并接受其文化”，“要么按照印度教徒的美好愿望离开这个国家。这是唯一合理和正确的解决方案”。<sup>⑥</sup>

不幸的是，在 1947 年前后，印度教徒对“准巴基斯坦人”的恐惧心理已经蔓延至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国大党高级领导人同样对其进行了“有罪推定”。在某种意义上，印巴分治的 1947 年是一个集体疯狂和精神错乱的时刻，所谓“第五纵队”说法的出现是印度的“巴基斯

① Ayesha Jalal, *The Sole Spokesman: Jinnah, the Muslim League and the Demand for Pak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

② Gyanendra Pandey, *Citizenship and Difference: The Muslim Question in India*, in Mushirul Hasan and Nariaki Nakazato, eds., *The Unfinished Agenda: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Asia*, p. 107.

③ V. D. Savarkar, *Essentials of Hindutva*, Pune: Hindi Sahitya Sadan, 2003, p. 37.

④ M. S. Golwalkar, *Bunches of Thoughts*, Bangalore: Sahitya Sindhu Prakashana, 2000, p. 148.

⑤ M. S. Golwalkar, *Bunches of Thoughts*, pp. 149, 151.

⑥ M. S. Golwalkar, *We or Our Nationhood Defined*, Delhi: Pharos Media & Publishing Pvt. Ltd., 2011, p. 47.

坦人恐惧症”集体爆发的标志，是印度教激进主义裹挟社会大众情绪的表现，是某些印度教徒政治家丧失冷静和判断力的明证。

根据印巴分治方案，印度、巴基斯坦和土邦三部分的面积分别为42%、13%、45%，各土邦可选择自由加入印、巴的任何一方或继续保持独立地位。根据英国政府的内部研判，分治后的印、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在全部的10500家官办工业企业中，只有700~800家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几乎所有的造纸厂、黄麻加工厂、金属加工厂和采矿业的工厂都位于印度境内。印度继承了（原殖民时期的）主要港口——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印度几乎拥有所有的煤、铁和锰生产区。巴基斯坦将会成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境内包含了大米生产区（孟加拉和信德）、小麦生产区（灌溉系统发达的西旁遮普）以及面积可观的茶叶种植区（希尔哈特镇，Silghat）。”<sup>①</sup>分治后，巴基斯坦的整体实力将不足以与印度对抗，这一事实是反对建国者提前预见了的。

20世纪40年代，在德里举行的一场大型集会上，反对建国者的组织“自由者之党”（Majlis-i-Ahrrar，英译名 the Party of the Free）的激进领导人阿塔·乌拉·沙哈·布克哈里（Ata Ullah Shah Bukhari）讲述了一件“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轶事：一位母亲让好贪小便宜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去商店买一罐煤油，在罐子盛满后，孩子请求店主再另送一点，并一下子将油罐倒置过来，让店主把赠品倒入罐底的凹槽；当孩子小心翼翼地捧了罐底的煤油回到家，面对母亲惊讶的询问，得意洋洋地解释说，这是他所赢得的额外的赠品。布克哈里讲述这则故事是颇有深意的，其目的在于为批判“巴基斯坦方案”做必要的铺垫：“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得意洋洋地把这个（人为构建出来的）巴基斯坦作为占印度四分之一人口的‘准巴基斯坦人’的归宿，（本质上）也是这个（故事中的）‘赠品’。”<sup>②</sup>事实上，布克哈里指出了真纳的巴基斯坦方案在地缘政治上的致命缺陷——领土面积萎缩且被印度左右分割。

分治后，绝大多数精英都前往了巴基斯坦，仍滞留印度的数千万“准巴基斯坦人”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遭遇了边缘化的窘境。<sup>③</sup>此外，在对土邦的争夺中，巴基斯坦也不敌印度：朱纳格特（Junagadh）、海德拉巴（Hyderabad）被强行并入印度，克什米尔的归属至今仍悬而未决。<sup>④</sup>更棘手的是，与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缺乏高技能劳动力，工业生产体系不健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sup>⑤</sup>这一切都是巴基斯坦独立建国所必须承受的现实代价。事实上，无论印巴是否分治，“准巴基斯坦人”始终处于一个“二难命题”的困境之中。如果选择分治，那么未来的巴基斯坦的版图将只有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的四分之一，且被切割为东、西两翼，其整体实力不足以与印度相抗衡，也无力保护其在印的“滞留者”；如果选择不分治，那么在与国大党的博弈中，真纳所领导的政党非但不能为“准巴基斯坦人”谋得更大的利益，甚至可能会丧失殖民统治时期业已获得的既有利益。在英国殖民者大势已去、行将退出南亚之际，“准巴基斯坦人”的利益无法在国大党所主导的政治格局下寻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因此，无论分治与否，印度次大陆“准巴基斯坦人”整体地位下降的局面都是不可避免的。

① The British Plan for the Partition of India, August 1, 1947,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FO), 371/63567.

②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Introduction, in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eds., *Muslims against the Muslim League*, p. 1.

③ Rajeev Singh, Citizenship, Exclusion & Indian Muslims,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1 (2), 2010, p. 503; Balraj Puri, Indian Muslims since Parti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8 (40), 1993, p. 2143.

④ Ian Copland, The Princely States, the Muslim League,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 in 194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3 (1), 1991, p. 38; Hyderabad Negotiations, November 4, 1947,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FO), 371/63571; Situation in Junagadh, November 18, 1947,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FO), 371/63571.

⑤ Phillips Talbot, *An American Witness to India's Partiti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2007, p. 348.

## 二、反对建国者的视角

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由真纳领导，虽然巴基斯坦构想获得了“准巴基斯坦人”的广泛响应，但在其内部仍然存在着反对巴基斯坦建国者。这些反对建国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以反对建国者的视角丰富了印巴分治时刻巴基斯坦人的历史叙事。<sup>①</sup>

在巴基斯坦建国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准巴基斯坦人”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秉持维护印度人民团结的立场，反对印巴分治，也反对真纳所提出的巴基斯坦建国理论。他们认为，印度人民是可以在同一个国家之中实现和平共处的。虽然在政治上印度人民分别支持不同的政党，但这种因选举逻辑所导致的差别并不重要，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情况下，原殖民地人民自然会成为现代国家的主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纳的巴基斯坦建国主张破坏了团结，分裂了印度。

在这些主张“印度人民大团结”的“准巴基斯坦人”中，阿布尔·卡拉姆·阿扎德（Abul Kalam Azad）便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在担任国大党主席期间，他代表国大党参与印度未来地位的谈判，是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交涉的印度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强烈反对印度分治，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既能够接纳印度教徒，又能够接纳非印度教徒。<sup>②</sup>阿扎德认为，在南亚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是毫无必要的。他始终主张后殖民时代的所有人民都应当继续保留印度公民身份。“我感到同样自豪的是，我是一个印度人，是印度国家不可分割的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是一名非印度教徒的事实）也是构成印度整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一点，这个崇高的大厦将是不完整的。我永远不会放弃这个真诚的主张……”<sup>③</sup>对于独立后印度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阿扎德在1945年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表示，对这一问题进行指责或追究没有任何意义，印巴分治是不可行的，非印度教徒的担忧可以通过设计一个合理的印度宪政计划加以解决；一旦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获得了独立，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内耗便不复存在，将会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sup>④</sup>

阿扎德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他未认清印度政治的现实——印度分治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国大党与真纳所领导的政党的手中。总体而言，阿扎德的宪政方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他的印度建国方案努力淡化印度人的内部差异对实际政治的影响。但在暴力事件日益猖獗的阴影下，他所提出的印度人民团结的方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阿扎德所设想的印度也只能是一个“理想国”。在英国殖民者撤离印度之后，印度教徒与非印度教徒就会恢复和睦相处的局面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选举中，选票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得到民众支持的标准。在分治之前，这一标准被英印政府、尼赫鲁和真纳三方共同接受。1945—1946年，印度举行独立前的最后一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表明，真纳所领导的政党得到了“准巴基斯坦人”选民的支持，该党取得了“准巴基斯坦人”之“唯一代表者”地位。<sup>⑤</sup>虽然这个“唯一代表者”地位被英印政府及国大党认可，但在“准巴基斯坦人”内部

① 当时“准巴基斯坦人”对印巴分治的看法，参见 Ayesha Jalal and Anil Seal, *Alternative to Partition: Muslim Politics between the War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5 (3), 1981, pp 415-454; David Gilmartin, *Partition, Pakistan, and South Asian History: In Search of a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4), 1998, pp 1068-1095.

② Kenneth Pletcher, Abul Kalam Azad,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Abul-Kalam-Azad>, 2019年12月1日。

③ Ian Henderson Douglas, *Abul Kalam Azad: An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Biograph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5.

④ V. P. Menon,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21.

⑤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Introduction, in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eds., *Muslims against the Muslim League*, p 6.

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真纳所领导的政党的主体成员是资产阶级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该党对广大中下阶层的工人、农民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巴基斯坦人”这一符号是无法轻易消弭其内部的阶级差别的，<sup>①</sup> 这便是在“准巴基斯坦人”内部产生质疑真纳所领导政党之“唯一代表者”地位的根本原因。“与国大党不同，真纳的政党并未发展成一个有效的大众型政党”。<sup>②</sup> 具体来说，对“唯一代表者”地位提出质疑的主要是城市无产者和经济上落后的农民群体。对这两类基层民众来说，真纳的政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无法代表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在印度北部及东部，全印莫明大会党（the All India Momin Conference）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组织之一。该党于1928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主要代表经济上贫困的工匠，特别是纺织工人的利益，并为群体中遭受压迫者发声。<sup>③</sup> 除此之外，莫明大会党还在中下阶层中开拓统一战线，联合其他劳工阶层，诸如蔬菜种植者及销售者、棉花工、裁缝和屠夫。<sup>④</sup> 对全印莫明大会党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质疑真纳所领导政党的“唯一代表者”地位的，它试图以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压迫的观点消弭真纳所强化的“准巴基斯坦人”符号。

由此可见，对真纳所领导的政党之“唯一代表者”地位的质疑是客观存在的，并非真纳所言是少数“准巴基斯坦人”假想出来的“伪命题”。总的来说，真纳一方在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并没有完全吸纳“准巴基斯坦人”内部的反对者，而是简单粗暴地将他们排斥在外。在巴基斯坦建立之后，真纳在1948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承认了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巴基斯坦的敌人并未阻止巴基斯坦的建立，他们虽然遭受了失败但并未灰心。如今，他们把注意力转向通过在巴基斯坦人中制造不和来破坏这个国家。”<sup>⑤</sup> 在印巴分治之前，反对建国者没有取得英印政府和国大党的承认，其质疑之声被真纳一方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但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后，这一问题便无处遁形了，最终以巴基斯坦宪政危机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真纳的巴基斯坦建国理论遭到的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侯赛因·艾哈迈德·马达尼（Hussain Ahmad Madani），一位杰出的文化学者和“复合印度国族主义”（composite Indian nationalism）的鼓吹者。<sup>⑥</sup> 马达尼坚决反对真纳所提出的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的主张，他的反对是围绕着真纳的建国学说的理论分歧展开的，围绕真纳对“巴基斯坦国”这一概念的具体理解问题表达了强烈的不认同。<sup>⑦</sup> 在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马达尼提出了自己的“复合印度国族主义”设计方案：印度实行民主宪政体制，拥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元首；国家建立专门学术机构，促进公民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同时由国家财政设立专门拨款，支持公民在国家教育机构中接受现代教育；在“复合国族主义”的语境下，“准巴基斯坦人”的价值和理念不会在印度强制推行，因为印度的世俗化是一个短暂的历

① Ashfaque Hoss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ssam-Bengal Borders and the Sylhet Referendum*,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7 (1), 2013, p. 286.

② David Gilmartin, *A Magnificent Gift: 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Election Process in Colonial Punjab*,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0 (3), 1998, p. 418.

③ Tanvir Salim, *Two Circles net*, [http://twocircles.net/2013jun05/forgotten\\_\\_saga\\_\\_momin\\_\\_conference.html](http://twocircles.net/2013jun05/forgotten__saga__momin__conference.html), 2019年12月1日。

④ Papiya Ghosh, *Muhajirs and the Nation: Bihar in the 1940s*, New Delhi: Routledge, 2010, p. xxviii

⑤ Address by Muhammad Ali Jinnah, Governor General of Pakistan, in Dacca, East Pakistan, March 21, 1948, the academic website maintained by Prof. Emerita Frances W. Pritchett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00islamlinks/txt\\_\\_jinnah\\_\\_dacca\\_\\_1948.html](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00islamlinks/txt__jinnah__dacca__1948.html), 2020年6月15日。

⑥ Yasmin Khan, *The Great Partition: The Making of India and Pakist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0; Hamza Alavi, *Social Forces and Ideology in the Making of Pakist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7 (51), 2002, p. 5124; Mushirul Hasan, *M. A. Ansari: Gandhi's Infallible Guide*, New Delhi: Manohar, 2010, p. 207.

⑦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Introduction, in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eds., *Muslims against the Muslim League*, p. 6.

史阶段，“准巴基斯坦人”有义务通过“劝导”（persuasion）使得所有印度教徒都最终认可国家的“普遍正当性”（the universal validity）。<sup>①</sup> 马达尼的“复合印度国族主义”与真纳建国理论的本质差异在于是否建立一个完全均质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马达尼的建国理论是一种两个阶段的方案：在第一阶段，“准巴基斯坦人”首先要与印度教徒组成一个共同的国家，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在第二阶段，通过劝导可使所有国民都自愿接受国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因此，以印巴分治的方式建立一个均质化的巴基斯坦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根据马达尼的理论，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印度教徒在未来终究会被国家的基本价值体系吸纳，印巴分治反而会使这个“马达尼版本的国家”损失大量潜在的公民。

由此可见，马达尼反对巴基斯坦建国，同时提出“复合印度国族主义”的主张，不应被理解为对巴基斯坦建国事业的破坏。在某种意义上，他提出的是另一种版本的巴基斯坦建国方案，只不过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名称为“印度”。在第一阶段，这个“印度”是一个与印度教徒共存的国家；在第二阶段，所有的印度教徒在国家感召力之下都会认可国家的基本价值体系。为了建立这个“马达尼版本的印度”，在第一阶段实现之前，“准巴基斯坦人”必须与印度教徒携手合作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以早日实现“印度”的独立。他所反对的是一个国土面积缩水了的巴基斯坦，换句话说，一旦选择了真纳的建国方案，巴基斯坦便主动丧失了众多潜在的公民。因此，马达尼的建国方案比真纳的巴基斯坦建国方案更为宏大和激进。

### 三、反对建国者的活动及其局限性

虽然在理论论辩的层面，反对建国者对真纳的巴基斯坦建国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但他们在实际政治层面却不足以与真纳相抗衡。从意识形态光谱的角度来说，反对建国者反对巴基斯坦建国的出发点是不尽相同的；但在实际政治操作的层面，反对建国者的反对活动却有诸般雷同之处：主要是以召开会议、写信等形式开展他们所擅长的意识形态的论争。从这一点来说，反对建国者始终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

1939年，全印莫明大会党戈勒克布尔（Gorakhpur）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与国大党联手，参与和争取印度独立，并反对伊克巴尔及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Chaudhuri Rahmat Ali）所提出的巴基斯坦国的雏形。1943年，全印莫明大会党在德里召开第八次大会，其议题主要聚焦于反对单独建立一个巴基斯坦国。这次大会的召开恰逢真纳大张旗鼓地宣传巴基斯坦建国主张的阶段，全印莫明大会党主席查赫鲁丁（Zaheeruddin）提出了一个十分要害的问题，即该党质疑真纳所领导的政党作为所谓的“唯一代表者”。他认为，真纳的政党只代表那些维护种姓制度以及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无法代表受压迫者的利益。“我们反对‘巴基斯坦方案’。根据我们的常识，这个所谓的‘巴基斯坦方案’只能赋予部分地理区域以自主权。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居住在这几个地区的民众也应当支持这个‘巴基斯坦方案’。这个方案是将我们引向毁灭的海市蜃楼……因建立巴基斯坦的主张，真纳的党对印度其余地区民众间存在的友好关系与兄弟感情造成了伤害。”<sup>②</sup> 事实上，这一情况在孟加拉地区得到了充分印证。<sup>③</sup>

<sup>①</sup> Aziz Ahmad, *Islamic Modernism in India and Pakist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92-193.

<sup>②</sup> Shamsul Islam, *Muslims against Partition*, pp. 138-139. 对孟加拉农民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参见 Partha Chatterjee, *Bengal Politics and the Muslim Masses, 1920-47*, in Mushirul Hasan, ed., *India's Partition: Process, Strategy and Mobiliza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68-270.

<sup>③</sup> Haimanti Roy, *A Partition of Contingency? Public Discourse in Bengal, 1946-1947*,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3 (6), 2009, p. 1376; Sana Aiyar and Fazlul Huq, *Region and Religion in Bengal: The Forgotten Alternative of 1940-43*,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2 (6), 2008, p. 1213.

1943年,全印莫明大会党在德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主要有两项内容。第一,再次重申全印莫明大会党是代表4500万莫明人(Momins)<sup>①</sup>的唯一组织,这意味着该党完全排除了其他政治组织,尤其是真纳所领导的政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代表莫明人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排除全印莫明大会党参与的情况下,真纳所提出的任何涉及到莫明人未来的政治安排都将遭到全印莫明大会党的反对。第二,坚决反对印巴分治,并要求印度立即实现独立。全印莫明大会党认为,印巴分治是缺乏操作性的、不必要的、对国家毫无益处的。因为印度不同省份的地理位置以及印度教徒与“准巴基斯坦人”的混居状态使得分治方案无法顺利实施,并且这种混居的状态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况且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基于此,在英国殖民统治者退出印度之后,印度人民将会自行恢复到和睦相处的状态。<sup>②</sup>此外,对真纳所宣称的“唯一代表者”地位,查赫鲁丁从成年人选举权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表示,如果在立法机构的选举中实行成年人普选,那么大多数席位将由全印莫明大会党获得。目前立法机构中代表的组成状况不能充分反映莫明人的真实力量,因为成年人的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他声称,全印莫明大会党仅1942年就拥有20万党员,未来党员数字将增加到50万。<sup>③</sup>

总的来说,反对建国者的活动仍主要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掀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反对建国者的活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对印度次大陆民主政治体制的影响极其深刻,殖民地人民已经习惯于按照民主政治的规则表达政治诉求,施加政治影响。他们所遵循的是以选举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无意抛开现有的民主政治体制寻求“另起炉灶”。虽然部分反对建国者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属印度现有的选举制度并非理想状态下一人一票式的普选制,而是以财产多寡作为能否享有投票权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存在缺陷的选票逻辑下,众多城市无产者和农民的投票权理所当然遭到了剥夺。来自“准巴基斯坦人”的选票大都集中于经济上比较宽裕的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手中,他们是真纳的坚定支持者,因此真纳所领导的政党必定会在现有选票的逻辑下脱颖而出,赢得“唯一代表者”地位。一定程度上,这个结果的产生与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选票逻辑有关,这一逻辑虽存在诸多瑕疵,但已深深植根于印度次大陆的土壤之中。反对建国者纵然希望选举制度得以完善,使选票能够真正反映其政治主张,但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选举制度本身。<sup>④</sup>反对建国者坚信,如果现有的选举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他们对真纳及其政党的反对主张是可以通过选票的逻辑得到表达和体现的。因此,反对建国者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最重要的斗争武器,并将其视为民主政治体制下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

第二,在暴力事件的阴影下,“准巴基斯坦人”的集体不安使反对建国者的支持者受众日益萎缩。事实上,绝对多数民众并不清楚真纳所言的“巴基斯坦”的真正含义,<sup>⑤</sup>他们在临近印巴分治时刻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求生欲。随着印度教激进主义的蔓延,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暴力事件日益猖獗,“准巴基斯坦人”对自身生命安全和特定文化无法得到保障的恐惧感与日俱增,不得不寻找一条求生的道路,以摆脱印度教激进主义的现实迫害。当真纳正式提出在印度次大陆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之后,他们将其视为拯救自身命运的最后一线生机,故此他们对这个语义含混不清的“巴基

① 印度北部及东部的无产者的自称。

② Shamsul Islam, *Muslims against Partition*, p. 139.

③ Shamsul Islam, *Muslims against Partition*, p. 141.

④ 关于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民主政治体制对印度的影响,参见 Judith M. Brown, *Modern India: The Origins of an Asian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3-378.

⑤ David Gilmartin, *Partition, Pakistan, and South Asian History: In Search of a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4), 1998, p. 1081.

斯坦”的支持是狂热的、无条件的、非理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反对建国者的反对主张相对冷静和理性，他们试图从理论层面找出真纳建国理论的缺陷和漏洞。但在印巴分治的历史时刻逐渐迫近之际，普通民众已经无法再用理性进行思考了。在集体疯狂和精神错乱的氛围下，反对建国者的政治力量日渐萎缩，在客观上已经不具备发动规模化的政治运动的可能。<sup>①</sup>

第三，印巴分治建国的迅速完成使得反对建国者丧失了继续攻击的靶点，因为反对建国的主张只有在巴基斯坦真正建立之前才有意义。1947年，艾德礼政府决定加速推进英国撤离印度次大陆的进程，《蒙巴顿方案》的仓促出台使得印巴分治在极短时间内成为现实，这是印度次大陆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长期以来，普通民众一直认为真纳所倡导的“巴基斯坦”的建立绝非易事，不会很快就成为现实。当印巴分治遽然完成，他们还不知道一个新的巴基斯坦国业已建立，对这个新生国家毫无概念。而对反对建国者来说，印巴分治是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实现的，导致他们无法对这一结果做出迅速的反应。

由此可见，反对建国者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真纳的巴基斯坦建国理论的意识形态论争，它并没有演变成规模化的政治层面的对抗运动。反对建国者对真纳发射的意识形态炮弹是空包弹，尽管这些空炮弹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但毕竟缺乏实际的杀伤力。当巴基斯坦已然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反对建国者也就不得不无奈地接受现实，承认他们的主张在现实政治面前遭遇了彻底的失败。

#### 四、反对建国者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

20世纪40年代早期，虽然反对建国者与国大党组成了反对真纳的政治同盟，但国大党并没有给“准巴基斯坦人”留下多少政治上讨价还价的余地，甚至连在未来统一的印度中所要求的合理的权利都无法实现。因而反对建国者的主张只能获得特定的部分人口的有限支持，难以获得广泛认可。在国大党放弃维持一个统一的印度的方案后，它改变了先前的政策，转而认可真纳一方的“唯一代表者”地位，彻底抛弃曾与之站在同一阵营的反对建国者。尽管反对建国者对真纳所提出的巴基斯坦建国方案予以全力抵抗，但印巴分治的命运已然无法改变。概言之，反对建国者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英国殖民者移交权力前夕，真纳的“巴基斯坦国父”地位已经确立且无法撼动，反对建国者遭到了真纳一方的极力压制。<sup>②</sup>在印巴分治实现的前夕，“真纳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近乎于顶礼膜拜式的崇拜”，<sup>③</sup>其巴基斯坦国父的地位已经无法撼动。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的高潮既是真纳的建国理论胜利的时刻，也是大多数“准巴基斯坦人”展现狂热忠诚的时刻。因此，在一个胜利与喜庆的氛围中，反对建国者的声音被彻底掩盖了。不仅如此，由于反对建国者对真纳一方进行公开指责，后者将此举视作公开挑衅和羞辱，认为这种来源于“准巴基斯坦人”内部的公开异议严重损害了其所声称的“唯一代表者”的地位。在“捍卫巴基斯坦”的口号下，真纳一方甚至对某些领头的反对

<sup>①</sup> 关于印巴分治对当时的人们所产生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影响，参见 Anirudh Kala and Alok Sarin, *The Partitioning of Madness*, in Sanjeev Jain and Alok Sarin, ed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Partition of Indi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2018, pp. 12-32.

<sup>②</sup> Lal Bahadur, *Struggle for Pakistan: Tragedy of Triumph of Muslim Communalism in India (1906-1947)*,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Pvt. Ltd., 1988, p. 293; Farzana Shaikh, *Making Sense of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9-40.

<sup>③</sup> Sikandar Hayat, *Aspects of the Pakistan Movement*, Islamabad: National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Publication, 2016, p. 269.

者采取了武力消灭行动，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准巴基斯坦人”内部的政治分歧。<sup>①</sup>

第二，在分治前夕，印度教激进主义已经在印度蔓延，反对建国者与国大党的同盟关系不复存在。印度教徒激进分子认为，非印度教徒与英国殖民统治者一样是“外来统治者”，强烈支持印巴分治。在日益频繁的暴力事件的阴影下，国大党许多高级领导人被裹挟着卷入了印度教激进主义的浪潮。“在规模和性质上，印巴分治中发生的暴力是极其严重的，这足以使印巴分治成为现代国家构建史上最具暴力色彩的事件之一。”<sup>②</sup> 20世纪40年代是英属印度本土政治格局急剧改变的时期，反对建国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在印度本土的政治舞台上，国大党、真纳所领导的政党和反对建国者三方形成政治分野和力量重组。国大党放弃了以往所坚持的反对印巴分治的立场，转而与真纳一方联合推动印巴分治，因此反对建国者便迅速成为孤家寡人。某种程度上，反对建国者所面临的困境与他们所选择的盟友戚戚相关。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加入了国大党，因此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所选择的是一条依附于国大党的路线。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国大党的一员，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身逐渐被国大党内的印度教激进主义者边缘化的现状。这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并非临近印巴分治才出现，而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征兆。国大党内的非印度教徒只是被当作该党赢得选票的工具，并未得到相应的来自国大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实际支持。<sup>③</sup>

在印度教激进主义者的宣传攻势下，真纳的巴基斯坦建国理论具备了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即真纳要带领“准巴基斯坦人”冲破印度教徒设置的不平等枷锁。在这种局面下，知识界对真纳的支持自然是在“巴基斯坦人的权利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氛围下逐渐累积的，同时也将这种情绪传递给了普通民众。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激进主义的情绪业已在国大党高级领导人中蔓延，国大党放弃了曾经坚持的印度不能分治的立场，这一局面使反对建国者骑虎难下，他们继续支持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团结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当“巴基斯坦人”这一符号遭到印度教激进主义浪潮的诋毁与攻击时，生存和逃生的逻辑便成了“准巴基斯坦人”的首选。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条逃离印度教激进主义迫害的道路，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规避印度教徒主导的局面。这种日益严重的“即将遭受迫害”的恐慌心理，使得巴基斯坦建国选项成为普通民众的“诺亚方舟”，支持反对建国者的受众随着1947年的逐渐临近而日益萎缩。

第三，印巴分治是英国殖民者、国大党与真纳所领导的政党三方博弈的结果，英国殖民当局只与国大党和真纳一方讨论如何移交权力，反对建国者被完全排除在外，因此他们最后遭遇失败的结果是必然的。反对建国者的人员构成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具备深厚造诣的学者，二是“准巴基斯坦人”中的国大党人。前者在政治上默默无闻，通常并不是公众人物，也并不热衷于投身实际的政治运动；后者尽管掌握一定的政治资源，但在国大党内处于边缘化的境况。在移交印度权力的谈判中，英国殖民当局认为，与国大党打交道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因为该党的主席阿扎德在国大党权力体系中并不掌握实权。甘地曾对英方谈判官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表示，国大党内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是尼赫鲁。作为甘地的亲密同志和特使，苏迪尔·高士（Sudhir Ghosh）则告诉作为老朋友的克里普斯，国大党实权派人物背后的神秘人物是甘地。实际上，高士暗示了一个关键信息——国大党内最后做决定的人是甘地，作为“准巴基斯坦人”的阿扎德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大党主席。<sup>④</sup> 因此，对于英国殖民当局来说，若要迅速完成印度权力的移交，只需同甘地实际主导的国大党和真纳所领导政党达成协议即可，无需将反对建国者纳入政治谈判的

① Shamsul Islam, *Muslims against the Partition*, p. 169.

② Kavita Daiya, *Violent Belongings: Partition, Gender,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Postcolonial Ind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

③ Mushirul Hasan, M. A. Ansari; *Gandhi's Infallible Guide*, pp. 223-224.

④ V. P. Menon,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 p. 137.

议程之中。

颇为有趣的是，虽然反对建国者在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的作用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忽视，但他们失败的后果倒是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反对建国者所要极力阻止的是印巴分治建国，换言之，印巴分治的后果便是反对建国者失败的后果。<sup>①</sup>

反对建国者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段实施了阻挠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的活动，但他们阻止巴基斯坦建国的终极目标失败了。巴基斯坦的建立以一种胜利与创伤共存的双重面貌呈现。1947年，巴基斯坦人在分享新的现代国家诞生的喜悦的同时，不得不忍受因分治而导致的阵痛。一方面，滞留在印度的巴基斯坦人处境尴尬。分治时，绝大多数英属印度的“准巴基斯坦人”前往了巴基斯坦，滞留在印度的“准巴基斯坦人”则要接受来自印度政府的所谓“忠诚测试”，被要求回答是否忠诚于印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沦为印度的“二等公民”。这一状况恰好印证了反对建国者对真纳的指责：巴基斯坦的建立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准巴基斯坦人”被这个新生的国家“彻底抛弃”了。另一方面，因印巴分治而引发的人口大迁徙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场人口大迁徙导致了5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另有约1400万人无家可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沦为难民。“20世纪50年代，印巴边境的难民流动始终存在”。<sup>②</sup> 在真纳所领导的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普通民众热情洋溢，甚至充满狂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巴基斯坦于1947年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但并非所有的“准巴基斯坦人”都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公民，“准巴基斯坦人”对“巴基斯坦国”这一概念的内部分歧依然存在。这便是巴基斯坦的建立给新巴基斯坦人所带来的创伤，并且这一创伤在建国完成后仍继续存在和延续。

## 结语

通过对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所遭遇的内部阻力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推论：一方面，可以从反对者的视角来证明巴基斯坦建国运动受欢迎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真纳所构建的“伟大历史叙事”背后挖掘出一些被隐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段与巴基斯坦建国运动的“伟大历史叙事”相悖的历史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的建立并非一个“一锤子买卖”的历史事件，它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基斯坦建国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理解反对巴基斯坦建国者的观点，对于重新评估印巴分治建国过程中“巴基斯坦人”这一符号形成的多种历史叙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真纳看来，作为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巴基斯坦建国理论是用来供巴基斯坦人缅怀“艰苦卓绝”的建国历程的。随着巴基斯坦的建立，它只拥有“收藏价值”，而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了。某种程度上，巴基斯坦的建立是真纳建国理论的一次生动实践，但真纳的建国理论并非完美无瑕，它尚有许多未解决的漏洞。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反对建国者纵然指出了真纳建国理论中所存在的某些漏洞，但真纳并未认真倾听，而是选择了漠视。客观上，反对建国者的主张被人为掩盖并不意味着真纳建国理论中的漏洞就会自行消失，在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所忽视的政治分歧还将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存在并发挥影响，这便是巴基斯坦建国的“未完成性”。

（责任编辑：王华）

<sup>①</sup> 关于印巴分治的后果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Jeff Hay, *The Partition of British Indi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6; Mushir-ul Hasan, ed., *India's Partition: Process, Strategy and Mobiliza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Yasmin Khan, *The Great Partition: The Making of India and Pakist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Lal Bahadur, *Struggle for Pakistan: Tragedy of Triumph of Muslim Communalism in India (1906-1947)*,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Pvt. Ltd., 1988.

<sup>②</sup> Tai Yong Tan and Gyanesh Kudaisya, *The Aftermath of Parti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225.

## “Unfinished Agenda”: A Study on the Domestic Resistance to Pakistan Movement

*Chen Zoubin*

**Abstract:** With the termin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in 1947, India and Pakistan were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the Mountbatten Plan. The birth of Pakistan was a victory of Muhammad Ali Jinnah's Pakistan founding theory. Those quasi-Pakistanis who were against the newly-born state fell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those who opposed the partition of India in favor of Indian people's unity; those who questioned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status of Jinnah's party and criticized the party's overlooking the claims of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those who refused to accept Jinnah's founding theory because of the disagreements over the concept of "the Pakistan state". D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nah's status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Pakistan and the spread of Hindu radicalism, the opponents of Pakistan Movement finally failed. Although Jinnah's opponents haven't prevented the founding of Pakistan, understanding their claims is of grea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evaluating the pluralism of the concept of "Pakistanis" in the Pakistan Movement.

**Keywords:** Pakistan Movement; "Pakistani"; domestic resistance; unfinished agenda